

认知中国： 文化研究的路径

侯且岸



著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京出版社

认知中国： 文化研究的路径

侯且岸 著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京出版社



作者近照

我与西北大学

西北大学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一所百年名校。20世纪50年代初，祖父侯外庐肩负重任，只身独往，前去主持校政，开始了他一生中倍感宽慰的一段珍贵时光。50年之后，我也来到西大，从师于张岂之教授，在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进行博士后研究。我不仅从这里真切感悟到祖父创业的艰辛，以及西大人对老校长的崇敬和眷恋，而且也真正受到西大淳朴求真学风的熏陶，像祖父当年那样以“韧的精神”、“抉疑的态度”努力探究“自得之学”。



2002年10月，我在西北大学出席纪念侯外庐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与学界前辈合影。他们是（右起）瞿林东、李学勤、龚书铎、张岂之诸教授。



2002年10月，在侯外庐塑像前，我与西北大学同窗好友合影。

我与张静如先生

张静如教授是我的导师。是他，引导我走上了学术研究之路。听张先生讲，他是在1986年北师大召开的一次关于“中共党史学理论研究”的学术讨论会上“发现”了我。以后，我们既是师生，也曾是研究的合作者，一起共同走过了20个春秋，彼此之间结下了深厚而真挚的情谊。从张先生身上，我不仅学到了求知的方法，也掌握了求生的本领。



2003年1月，静如师70寿辰并从教50周年，我与同门师兄为之庆贺。

我与学生

以我的秉性，最适合生存的地方是学校，最乐于接触的人是学生。屈指算来，我从教已近25年。特别是近3年，我在北京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担任博士生导师，这更使我体味到“传道、授业、解惑”的乐趣，也使我的研究成果明显增多。我看准了当今中国高等教育的缺失所在，有针对性地对研究生进行以“通识教育”为基础的“学术思维训练”，从中逐步摸索出一条颇受学生欢迎的教育理路。同时，我也在国际学术交流中把跨文化讲座开到了美国的高等学校。



2006年6月，我与自己所指导的北京师范大学的博士生在一起。



2001年4月，在美国俄亥俄州鲍德温学院，我（前排中）给MBA专业学生讲授跨文化专题课之后合影。

我的国际学术交流

近些年来，我的学术得以延伸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高层次的国际学术交流。认知中国，熟识“庐山真面目”，很需要从“山外看山”中选择不同取向，获得不同感觉，厘清一系列概念，做出深刻反思。我将继续沿着这条道路探索下去。



1999年4月，我在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



1999年4月，我与华威顿大学中国研究所所长薄克敏。



1999年4月，我与耶鲁大学图书馆东亚研究部龚文凯博士。



1999年4月，我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白霖教授。

费正清的名字，中国学者并不陌生，但真正了解他的人并不多，理解他的人可能更少。我对费正清着实做了一番比较深入的研究，并且一直在思考着一个问题：为什么具有不同意识形态利益的各个方面，在反对费正清的立场上却是默契的？我将它称之为“费正清现象”。1999年4月，我到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访学，真切感受了这一美国中国研究“重镇”的底蕴，于是对“费正清现象”有了彻悟。



我在美国中国研究“重镇”——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



我和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莫尔·戈德曼教授。



斯图亚特·施拉姆是美国著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总体来说，他对毛泽东的研究是客观的、理性的。从研究取向上看，他的很多观点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他很早就关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并且提出：应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内部问题，而不是外部问题。因此，我们要努力探寻中国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血缘关系（摄于1999年4月）。



我在与美国的“文革”史专家麦克法夸尔的交谈中越发深入地感到：在美国的中国研究中，“文化大革命”研究是名副其实的“显学”。也正是由于“文革”，美国人才更加关注东方。上个世纪的60年代，整个世界沉浸于激进政治文化之中。欧洲和美国都产生了激进势力。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学者从实用主义立场出发，转而研究中国的现实。在他们看来，理想主义并不是美国学术的传统，但当一种乌托邦理想付诸实践的时候，他们就必须给予充分的关注。他们把当时的中国看作是人文社会科学最理想的实验室（摄于1999年4月）。



在美国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当中，被称为BANANA的人，格外引人注目——他们就是美籍华裔学者。这些学者具有独特的双重文化背景和知识结构。他们的学术思维值得我们借鉴。我所仰重的周策纵教授是老一辈华裔学者的杰出代表。他渊博的学识、缜密的思维、透彻的洞察力使我获益匪浅，为我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导向”。周先生亦是一位豁达开朗、和蔼可亲的长者。作为后学的我，和他相处未感拘束，能够很快进入状态（摄于1999年4月）。



在美国中国学界，保罗·柯文代表着战后新一代的学者。20世纪70至80年代，他们向以费正清为代表的中国研究的传统“冲击——回应”模式提出挑战，进而发出了“在中国发现历史”的理性呼声，确立了“中国中心观”的学术定位。同时，他也热忱希望：中国学者要理解美国学者和他们所惯用的取向与概念，相互“移情”，真正走入对方的思想世界，开辟新的认知路径，以避免人为的误读（摄于1999年4月）。



俄罗斯汉学有着悠久的传统，只是今天，与往日的辉煌相比，已逊色许多。但俄罗斯汉学家中仍有像季塔连柯这样执著地为发展俄中友好关系而忘我工作的人。2005年9月，在莫斯科举行了“中国与世界文明”国际学术讨论会。他与我满怀信心地相约：让我们共同为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树立起俄罗斯改革的正面形象而努力工作！

自序

自从在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到1999年出站以后，我的思想触点和学术兴趣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学术认知领域亦随之有所转移。特别是近几年，由于我对文化的深入理解和跨文化研究的实际需要之至，便越发关注有关文化理论、取向和概念的研究，并且还有意识地把这种研究同实施“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研究生教学实践中加以展现、丰富和完善。应该说，本书就是这方面心得成果的集中体现。收入本书的文章大多已经公开发表在这样一些主要刊物上：《史学理论研究》、《教学与研究》、《中共党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新视野》、《学习时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社会科学报》，等等。

细心、内行的读者也许会就此发问：文化理论、取向和概念何来重要？它在整个文化研究中处于怎样的地位？它与你所倾力探究的跨文化理解问题是什么关系？它和思想史研究又有何种姻缘？等等。

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需要回忆我同著名美籍华裔学者周策纵先生的一次重要会面，正是那次使我获益匪浅、终生难忘的见面直接激励着我开始着手进行上述特殊的文化理论探索。那还是1999年的春天，由于我在对美国汉学研究方面所有的初步建树，有幸得到了美国新闻总署（该机构现已被并入国务院）的资助，参加“国际访问者”（International Visitor）项目，对美国主要的中国研究中心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学术考察。对这次考察，中间的每一段

具体行程，我们双方都进行了十分周密的准备，计划可谓异常精细，细化到所会见的每一位学者的访谈时间和基本内容，真正使我从中领略到了对方的高效和严谨。

作为美国中国研究的“重镇”之一，威斯康星大学是我的首选之地。在那里，我特别想见识两位资深望重的学者：一位是周策纵先生，另一位是莫里斯·迈斯纳先生。但不巧的是，后者到英国去了。得美籍华裔学者吴瑞卿博士力助，我和周先生的会面如期进行。

周策纵先生以其博学和独特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红学研究享誉美国学术界，一直是我崇敬的长者。他虽已是耄耋之年，但思维依旧深邃、敏捷。因此，我特别想从他那里了解到他对美国汉学界的真实看法，聆听他的教诲。我把访谈的主题很快切入到中国的中国研究。但周先生在明白了我的意图后，并没有直接进入这个主题，而是把话题转向了思维认知领域。他对我说，“我们做学问，首先需要厘清所用的概念和术语。否则，在现代学术背景之下，几乎无法开口讲话”。他还给我分析了国人轻视精确规范概念和术语的原因：“由于读了更多的外语，使我深深感到，从古代起，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不免有两个最基本的缺失：一个是逻辑推理不够精密，尤其是在实际议论时不能严密运用‘三段论法’（Syllogism）。另一个缺失看来很简单，却可能更基本，我们对‘认知’的意识不够发达。从先秦起，‘是非’就逐渐变成道德词汇，不是指实之词了。‘是’、‘为’、‘乃’作为指实词，用得很不普遍和明确。汉语动词作名词用自然太多了，可是‘是’作为 to be 或 being 意义用作名词者，恐怕古代并不多见。我只不过用这个例子来说明，我们传统上‘认知’是什么不是什么的意识，发达得可能不充分。这两点是我去国五十年来的痛切感觉，对不对自然是另一个问题，但对我后来的治学研究，关系不小。”

说实话，对周先生的这番话，我当时的感悟并不够深透。回国后，对照他的有关文章反复阅读、反复体味，才明白了其中的奥

妙：周先生是在引导我分辨中国学术一直难于正常发展的症结所在。同时他也要告诉我，如果对美国学术界所使用的思维、范式和概念都没有基本了解的话，又如何对他们的中国研究进行研究呢？！这的确是我从事美国中国研究以来所遇到的最为关键的问题，也是新的挑战。在周先生的激励之下，我开始越发重视对学术思维的思考，并进而深入到以中西文化为背景的对中西思维方式差异的研究，从中导引出了本书。所以，在这篇序言中，我要向周策纵先生特别表达内心的敬仰、感激和喜悦，并祝他健康长寿！

确实，学术思维问题是一个非常值得中国学人重视、关心、思考的基本学术问题，尤其是对取向和概念的认知，对语境的认识，更是不容忽视。虽然国内目前尚缺乏这方面的深入研究，但我也注意到，已陆续有涉及这方面研究的译著出版。比如，[英] 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年版），[英] 奈杰尔·拉波特乔和安娜·奥弗林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鲍雯妍等译，华夏出版社 2005 年版），[英] 丹尼·卡瓦拉罗的《文化理论关键词》（张卫东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等等。我相信，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化，一定还会有更有分量的中文著作问世。我们期待着这一天！

从学源上看，本书所涵盖的内容是我的美国汉学研究的副产品，但它的学术意义和学术价值又都大大超出了汉学研究本身，因为它所要试图揭示的是一个被人遗忘的领域（往往被人们在既定的思维下回避，也可以说是“不想”）。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的作用亦在于唤醒、亦在于启蒙。当然，由于本书所涉及的问题的特殊，自然会引起争议，这也是我意料之中的。因为我在讲授有关内容时，就已经遇到过不同的看法，以至于出现比较激烈的争论。我真诚希望得到读者理性而公允的批评。

这里，我还想告诉读者的是：通过文化理论、取向和概念的研究，使我迫切希望打开它与思想史研究的“通途”，将文化思维问